

西亚出土(水)元代瓷器相关问题分析 ——关于遗址分布、瓷器组合及输出方式的考察

Analysis of Yuan Dynasty Porcelain Unearthed or Recovered from Water in West Asia: An Investigation into Site Distribution, Combination of Porcelain Wares, and Mode of Export

项坤鹏 Xiang Kunpeng

故宫博物院, 北京, 100009

秦大树(通讯作者) Qin Dashu

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 杭州, 310015

内容提要:

在西亚出土(水)了大量的元代瓷器, 在远印度洋的遗址呈现出以浙江龙泉青瓷和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釉瓷和青花瓷为主的组合面貌, 而在近印度洋的港口、沉船遗址中, 除了以上诸瓷, 还有一定比例的福建、广东窑场产品和磁州窑风格产品, 两类区域的瓷器组合是当时在利润驱动下市场不同选择的结果。通过瓷器面貌和遗址分布范围, 并结合文献记载, 可知当时的运输路径有海路、陆路及海陆接驳三种方式。在贸易过程中, 除了直接贸易外, 还形成了围绕着区域节点城市(如伊朗的米纳布、霍尔木兹岛, 伊拉克的瓦西特)展开的接力贸易模式。

关键词:

西亚 元朝 瓷器组合 输出方式

Abstract: A large amount of Yuan dynasty porcelain has been unearthed or recovered from water in West Asia. Sites far away from the Indian Ocean reveal a combination of celadon wares from the Longquan kilns in Zhejiang, and bluish-white-glazed, egg-white-glazed, or blue-and-white porcelain from the Jingdezhen kilns in Jiangxi. At port sites and shipwrecks near the Indian Ocean,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porcelain types, there are a certain number of kiln product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as well as products in the style of Cizhou ware. Combinations of porcelain in these two regions resulted from profit-driven market selections. Based on the visual features of porcelain war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by reference to related literatur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transportation routes: sea, land, and sea-land. In addition to direct trade, a relay trade model was also formed around regional node cities such as Minab and Hormuz Island in Iran and Wasit in Iraq.

Key Words: West Asia; Yuan dynasty; combination of porcelain wares; mode of export

历史上中国与西亚互动频繁,陶瓷器是重要的媒介,无论是官方往来,抑或是民间交流,皆不乏见其踪影。尤其在元朝所对应的时空中,伴随着蒙古的开疆拓土,中国陶瓷器大规模地进入西亚。这一现象在考古工作中显露无疑。本文拟对西亚出土(水)元代瓷器的遗址进行概括分析^[1],并归纳其瓷器组合特征,进而对其输出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西亚出土(水)元代瓷器遗址概述

西亚出土(水)元代中国瓷器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可将诸遗址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毗邻印度洋的港口、沉船遗址;第二类为距离印度洋稍远的内陆遗址。

(一) 港口、沉船遗址

当时中国与西亚的海路沟通主要是通过印度洋进行的,在海岸线附近的若干地区均发现有元代陶瓷器,据初步统计包括:伊朗的米纳布(Minab)^[2]、霍尔木兹岛(Hormuz Island)^[3]、基什岛(Kish Island)^[4]、西拉夫港(Siraf)^[5]、布什尔半岛的里沙赫尔港(Rishahr)^[6]、马胡尔班港(Mafruban)^[7];阿联酋的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al-Nudud)^[8]、阿尔马塔夫(al-Mataf)^[9];阿曼苏丹的苏哈尔城(Suhal)^[10];也门的亚丁(Aden)^[11]、舍尔迈(Sharmah)^[12]、津季巴尔(Zingibar)^[13]和扎哈兰(Zahlan)^[14];巴林的卡拉特·巴林遗址(Qal'at Bahrain)^[15]。此外,也门附近红海海域发现的一艘沉船中,也出水了若干元代青花和青瓷^[16]。

(二) 内陆遗址

除了港口和沉船遗址,在距离印度洋较远的内陆地区也发现了元代瓷器的踪迹。如:伊朗的锡尔詹城(Sirjan)及周边地区^[17]、瑙鲁赞(Nawruzan)和基尔(Chir)^[18]、尼沙布尔(Nishapur)^[19]、列伊(Ray)^[20]、巴姆城(Bam)及周边地区^[21]、近设拉子城的加斯里·阿布·纳斯尔(Qasr-i Abu Nasr)^[22]、设拉子城南部的菲鲁兹阿巴德(Firuzabad)^[23]以及马什哈德(Mashhad)^[24]等地;阿塞拜疆的希尔万夏贺夫宫和阿兰·卡拉遗址;也门的考德安赛拉(Kawd am-Saila)^[25]、阿哈比尔(Al-Habil)^[26];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27]、哈马故城(Hamah)^[28]、泰尔·艾卜亚德(Tell Abiad)^[29];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和巴格兰(Baghlan)^[30];伊拉克的萨马拉(Samarra)^[31]、瓦西特(Wasit)^[32]、泰西封(Ctesiphon)^[33]、巴格达(Baghdad)^[34]等地;黎巴嫩的巴勒贝克(Baalbek)^[35]等,均有元代瓷器出土。

二 瓷器组合：品类、品质与占比

（一）港口、沉船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在近印度洋的港口、沉船遗址等处出土元代瓷器的品类，主要包括青瓷、青花瓷、青白瓷、卵白釉瓷、白瓷、酱釉瓷、白地黑花瓷等。

青瓷以龙泉窑产品居多，如：伊朗米纳布出土有莲瓣纹碗（图一：1）^[36]、莲瓣纹盖碗（图一：2）^[37]、菊瓣纹贴花碗（图一：3）^[38]、双鱼洗（图一：4）^[39]、蔗段纹洗（图一：5）^[40]、菊瓣纹盘、大罐、小罐（图一：6）^[41]、贴塑花卉纹香炉（图一：7）^[42]、高足杯等；霍尔木兹岛出土有菊瓣纹盘（图一：8）^[43]；基什岛出土有菊瓣纹大碗（图一：9）^[44]、菊瓣纹大盘（图一：10）^[45]等；西拉夫港出土有碗、盘（图一：11）^[46]等。阿联酋的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出土有模印花卉纹碗口沿残片（图一：12）^[47]、碗腹及底部残片（下腹部近圈足处有铜钉痕，图一：13）^[48]、碗口沿残片（图一：14）^[49]、刻划莲瓣纹碗残片（图一：15）^[50]、贴塑双鱼纹盘残片（内底有铜钉痕）、莲瓣纹盘残片（口沿下部有铜钉痕，图一：16）^[51]等。阿曼苏丹的苏哈尔城出土有若干碟、碗等残片。也门的舍尔曼出土有碗、盘腹壁残片；津季巴尔出土有模印花卉纹敞口大碗瓷片。巴林的卡拉特·巴林遗址出土有刻花莲瓣纹碗、模印菊瓣形花口碗、印花八宝纹碗、内底贴菊花纹大碗、贴花双鱼纹折沿盘、菊瓣纹折沿盘、刻花折沿盘、葫芦瓶等。也门附近红海海域沉船出水有一件菊瓣形花口大碗，制作精良。

青花瓷、青白瓷和卵白釉瓷主要产自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如：伊朗的米纳布出土有青花瓷碗（图二：1）^[52]；基什岛出土有青花瓷碗、钵等；布什尔半岛里沙赫尔港出土有青花瓷碗（图二：2）^[53]。此外西拉夫港、马胡儿班港也有出土。阿联酋的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出土有青花折枝花卉纹碗（图二：3）^[54]等。也门的扎哈兰出土有青花瓷残片。巴林的卡拉特·巴林遗址出土有莲纹残片及瓶腹残片，缠枝花卉纹细瓷碗，饰瑞果纹、花草纹、折枝纹、荷莲纹、缠枝莲纹、庭院纹等的折沿盘、菱口盘、分瓣盘等，卷草纹小罐^[55]等。红海沉船出水有50余件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器型以碗、盘、罐为主（图二：4—8）。青白瓷如：伊朗的基什岛出土有青白瓷罐（图二：9）^[56]；阿曼苏丹的苏哈尔城出土有铁褐色斑点纹青白瓷狮子（背上饰莲花纹残破小塑像）以及小瓶残片。巴林的卡拉特·巴林遗址出土有模印花纹碗、素面扁圆形青白瓷盒、模印花卉纹白瓷碟等。卵白釉如：伊朗的米纳布出土有卵白釉高足杯（图二：10）^[57]及碗残片；基什岛出土的卵白釉碗（图二：11）^[58]。此外，西拉夫港、马胡儿班港也有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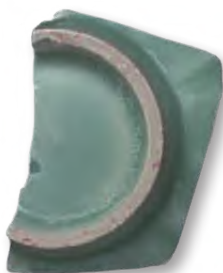
福建诸窑生产的白釉、青釉产品也有出土。白釉如：基什岛的碗、盘等，马胡儿班港的残片，阿尔马塔夫遗址出土的德化窑产品等。青釉如：基什岛出土的碗、盘等；马胡儿班港出土的碗。西拉夫港也有出土。此外，一些酱釉产品也可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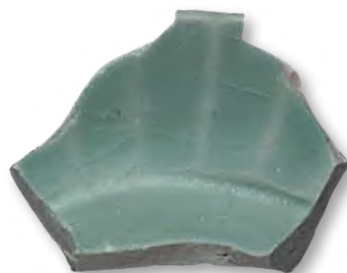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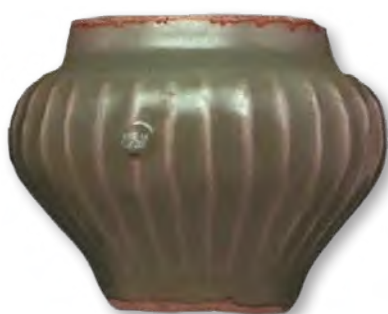
3



4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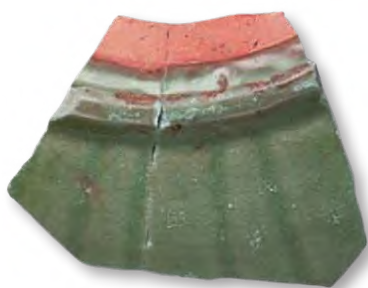
7



8



9



10



11



图一 港口、沉船遗址出土的元代龙泉青瓷

1. 莲瓣纹碗 2. 莲瓣纹盖碗 3. 菊瓣纹贴花碗 4. 双鱼洗 5. 蕉段纹洗 6. 菊瓣纹盘、大罐、小罐
7. 贴塑花卉纹香炉 8. 霍尔木兹岛出土有菊瓣纹盘 9. 菊瓣纹大碗 10. 菊瓣纹大盘 11. 碗、盘
12. 模印花卉纹碗口沿残片 13. 碗腹及底部残片 14. 碗口沿残片 15. 刻划莲瓣纹碗残片 16. 莲瓣纹盘残片 (1-11 采自故宫博物院考古所、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 年第 5 期；12-16 采自赵冰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国佐尔法·努杜德港口遗址出土中国瓷片》，《文物》2014 年第 1 期)



1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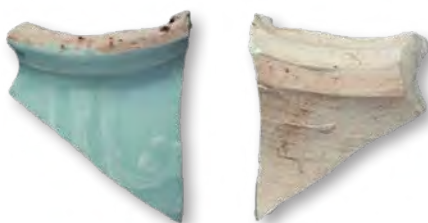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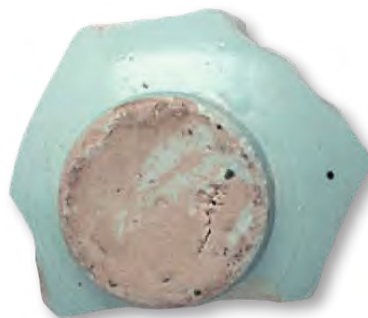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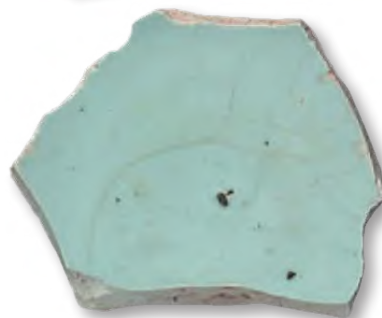
8



9



10



11



12

图二 港口、沉船遗址出土元代青花瓷、青白瓷、卵白釉瓷等

1. 青花瓷碗 2. 青花瓷碗 3. 青花折枝花卉纹碗 4-8. 青花瓷碗、青花瓷盘、青花瓷罐 9. 青白瓷罐 10. 卵白釉高足杯 11. 卵白釉碗 12. 白地黑花大罐 (1、2 采自故宫博物院考古所、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 年第 5 期；3 采自赵冰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国佐尔法努杜德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文物》2014 年第 11 期；4-8 采自箱康额君《西亚与南亚发现的元青花瓷器以红海沉船为中心》，《幽蓝神采：2012 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9-12 采自故宫博物院考古所、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 年第 5 期)

能产自福建抑或广东，如：基什岛出土的酱釉瓷片；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出土黄褐釉大罐残片。

另外还见有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产品,如基什岛出土有白地黑花大罐(图二:12)^[59]等。

由此看来,近印度洋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以浙江龙泉青瓷数量居多,出土地域也最广;其次是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青白瓷、卵白釉瓷;福建、广东窑场生产的青瓷、白瓷和酱釉瓷等也占有一定比例;磁州窑风格的产品虽然也参与其中,但数量极少。就产品品质而言,总体来说质量颇高,甚至不乏质量精美者,如伊朗的米纳布、基什、西拉夫,巴林的卡拉特·巴林,也门附近的红海沉船等地发现了高质量的浙江龙泉青瓷或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

(二) 内陆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在远印度洋的内陆遗址发现的元代瓷器品类包括青瓷、青白瓷、青花瓷、卵白釉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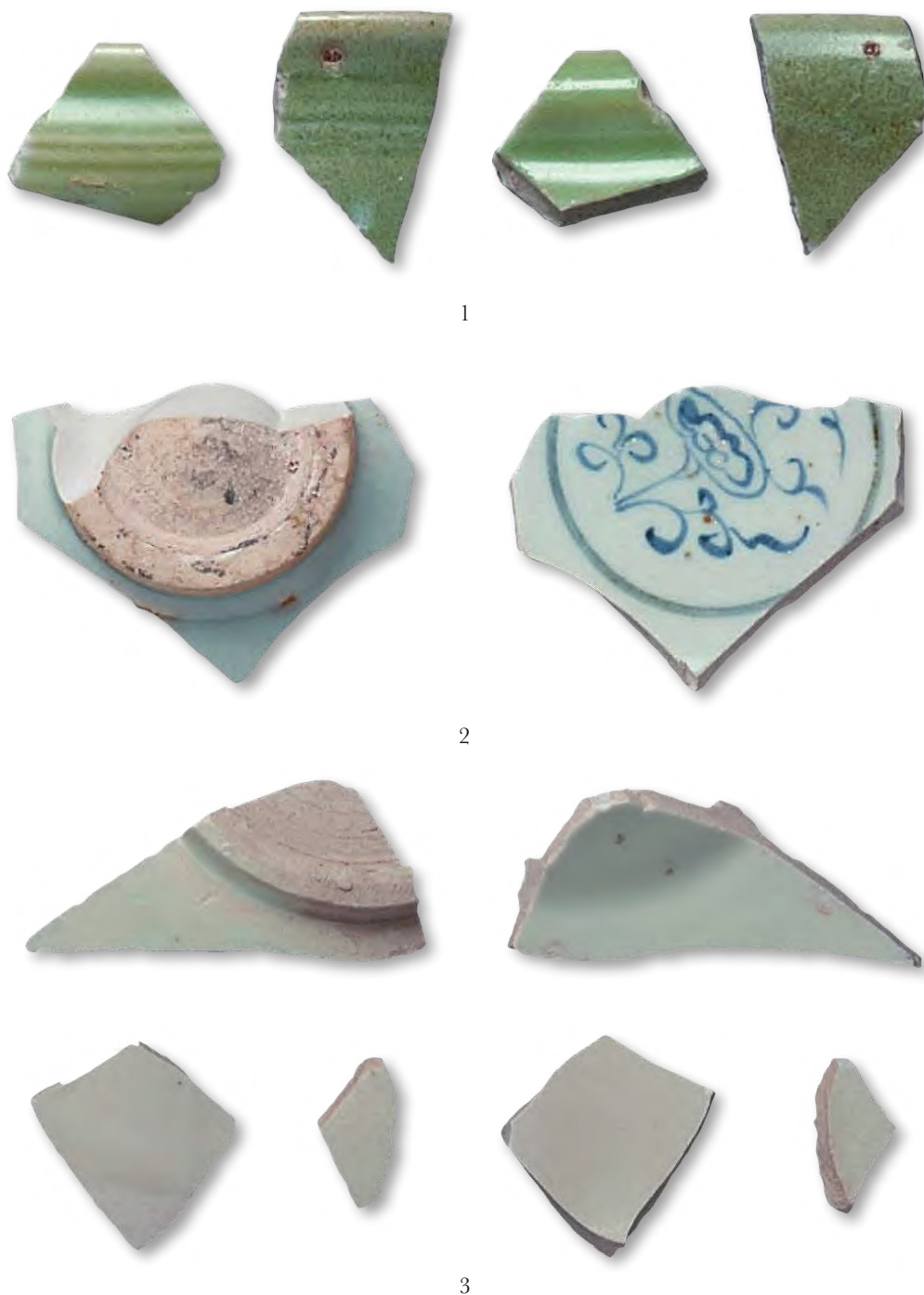
青瓷同样以龙泉窑产品居多。如:伊朗锡尔詹城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盘残片(图三:1)^[60]等;伊朗列伊出土有青瓷片等。叙利亚的哈马遗址也发现有龙泉青瓷残片。阿富汗的喀布尔见有明初龙泉青瓷大盘,推测应为龙泉官器。伊拉克的萨马拉、泰西封、巴格达、瓦西特等地均发现有元代龙泉窑青瓷,后者曾为阿拔斯王朝首都,所见龙泉大碗底心钻孔、其上贴菊花纹,也应为龙泉青瓷中的精品,此外巴格达的宫殿遗址出土有龙泉青瓷,质量极高。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出土有龙泉青瓷残片。

青花瓷、青白瓷和卵白釉瓷来自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如:伊朗的瑙鲁赞和基尔地区出土有景德镇窑青花瓷碗残片(图三:2)^[61]等,此外尼沙布尔、加斯里·阿布·纳斯尔、设拉子城南部的菲鲁兹阿巴德亦出土有青花瓷残片,马什哈德发现有绘鱼藻纹青花瓷残片,质量颇高。也门的考德安赛拉、阿哈比尔出土均有元青花残片,后者还出土有绘池藻游鸭纹的青花瓷器。阿富汗的巴格兰出土有元青花大盘,制作精工。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出土有元青花花草纹碗残片。青白瓷如:锡尔詹城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青白瓷碗残片(图三:3)^[62]等,此外在近设拉子城的加斯里·阿布·纳斯尔地区亦出土有青白瓷残片。

大致而言,远印度洋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数量较近印度洋地区要少。但同样是以浙江龙泉窑产品为主,景德镇窑产品次之,却几乎不见福建、广东和中国北方的产品。此外代表着较高社会层级交流的高品质元青花瓷器及龙泉青瓷器等,在后者出现得也颇为频繁,如阿富汗的喀布尔、巴格兰,伊拉克的瓦吉特、巴格达,伊朗的马什哈德,也门的阿哈比尔等均有所见。

(三) 小结

综上所述,在西亚出土(水)的元朝瓷器中,浙江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产品^[63]占据主流。在近印度洋的诸遗址中,福建、广东地区的窑场产品也占有一定



图三 内陆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1. 龙泉窑青瓷盘残片 2. 景德镇窑青花瓷碗残片 3. 青白瓷碗残片 (1-3 采自故宫博物院考古所、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 年第 5 期)

比例，北方窑场除了磁州窑风格的产品见于伊朗的基什岛外，其余地区尚未发现。检视当时国内窑业，元代南北瓷业总体繁荣，北方地区如河南的钧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磁州窑、山西的霍州窑等，南方地区如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以及福建、广东的诸多窑场等均表现出较强的活力。而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产

品在西亚瓷器市场中主导地位的形成,除了与它们生产出了青瓷、青白瓷、卵白釉瓷、青花瓷器等广受青睐的产品有关外,恐怕亦不能脱离当时瓷器输出方式,尤其是海路运输渐趋兴盛的助力,而福建、广东两地作为贸易港口泉州、广州的所在地,其地域范围内的瓷器产品在西亚的发现,也是对这一说法的佐证;同时内陆遗址中见到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产品也提示我们,当时的陆路运输值得重视。因此,元朝与西亚瓷器贸易中的海陆运输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下文讨论的重点之一。不惟以上,西亚考古中发现的其他现象,如:西亚诸遗址中高质量产品与质量稍微一般产品或同时存在;近印度洋遗址和远印度洋遗址所见元朝瓷器虽有差异但主体一致(主要为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产品);瓷器在交通节点城市与非节点城市分布数量多与寡,等等,也都激发着我们对当时两地之间运输路径、贸易模式中细节的深入思考。

三 输出方式:运输路径与贸易模式

元朝瓷器是通过何种方式输出至西亚的?或可将其分为运输途径和交易模式予以解析。前文已将相关遗址按照毗邻印度洋和远离印度洋的界限予以罗列,前、后两类地点均可分别勾连成带状分布,彼此之间还存在关联区域,这就预示着当时的运输方式存在着海、陆两种形式且互有联系。此外,从遗址及其瓷器分布中可寻得瓷器交易模式的端倪,除了两端地点的直接贸易外,从局部中心地点展开的接力贸易也不容忽视。

(一) 海路

在西亚的若干港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元代瓷器。关于这些瓷器的流布方式的探讨,海路首当其冲。元朝基本延续了南宋的政策,对海上交流持开放态度,因此元朝与西亚之间的海路往来也不乏其例。如孛罗^[64]、马可·波罗与阔阔真一行^[65]、大德三年(1299年)元朝赴霍尔木兹的使者^[66]、杨枢^[67]、鄂多立克^[68]、汪大渊^[69]、伊本·白图泰^[70]等。至治三年(1323年)元朝政府采用“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71]政策,海路贸易逐渐兴盛,不惟元人,阿拉伯人也参与其中。马穆鲁克传记资料曾记载“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一位出生于阿勒颇,名为阿早丁的喀里迷商人就数次经由这条线路参与印度洋贸易。史书记载,他曾五度航海前往中国,他的出发点有时是弼思罗(今巴士拉),有时则是怯失岛和忽鲁模思。据信他贩运的主要商品包括数额巨大的中国丝绸。另外他也在印度和亚丁经商,并由此获得了‘故临人’(al-Kūlamī,今译奎隆,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喀拉拉邦)的绰号”。“其名同时也见于也门Rasūlid(1229-1454)编年史。据记载,他兜售给也门算端的中国商品包括三百包丝绸、四百五十磅麝香、青色中国瓷器、镶嵌金饰的玉盘、男女奴隶,以及五磅钻石。”^[72]“青色中国瓷器”,很可能就是龙泉青

瓷。行海路者公私皆有，既有官本船（如杨枢），又有私人贸易（如汪大渊），同时不乏官私合船并行。《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中国船只共分三类。……（大船）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西亚港口遗址中精品瓷器与普通瓷器的混杂，红海沉船中既有精美青花大盘，也有绘制简率的中式纹样碗^[73]，正是该历史现象的反映。

在元朝经由东南亚、南亚至西亚海行路线所关联的沿海遗址及海域沉船中，也多见元代瓷器出土，由此也完善了中国与西亚之间的海路运输路线。如：泉州法石沉船^[74]、漳州圣杯屿沉船^[75]、白礁一号沉船、文甲大屿沉船、北土龟礁二号沉船^[76]、沙洲岛沉船^[77]、大练岛一号沉船^[78]、莱屿沉船^[79]、海南西沙群岛沉船群（北礁一号早期、三号早期、四号、五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赵述岛二号，银屿一号、二号，石屿一号早期、二号、四号沉船等）^[80]、马来西亚海域的玉龙号沉船^[81]、印度西亚海域民丹岛沉船^[82]、枢府沉船^[83]、新加坡淡马锡沉船^[84]、沙都姆岛沉船^[85]、斯里兰卡尼勒韦利沉船^[86]等。沉船之外，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的沿海陆地遗址中，均出土了元代浙江龙泉青瓷、江西景德镇青花和福建诸窑场的白瓷、青瓷等^[87]。此外，在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港口^[88]、巴拉特伊尼·科拉买、科特卡努努、东南海岸的别利亚巴台那买村^[89]、斯里兰卡的波隆纳鲁瓦、雅巴哈瓦、达地加马、攀多尼瓦^[90]、马尔代夫的马累等地^[91]、巴基斯坦的曼波尔^[92]等地也出土了数量颇多的元代瓷器。尽管有些沉船的航行轨迹尚不清晰，但无论如何，以上沉船以及近海遗址的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和西亚两地之间海路航线的缺环。从中可见，从中国到西亚的沉船、港口遗址中，出土瓷器保持着几乎相对固定的组合——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卵白釉瓷、青花瓷以及福建、广东等地的瓷器。这些瓷器主要产自中国南方，较之北方瓷器，因为其与出海港口的距离较近，运输便捷且成本低，故而成为海运的优先选择。

（二）陆路

正如上文所述，在西亚的远印度洋地区出土了为数颇多的元代瓷器，关于这些瓷器的来源方式，陆路运输是必须要考虑的选项之一。从历史背景来看，蒙古的崛起改变了此前东、西方之间政权林立、行旅寥寥的状况，陆上通道虽然间有阻断，但总体畅通，有大量的使团、商人等穿梭往来于元朝与西亚之间，自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期间，就有海屯^[93]、常德^[94]、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95]、列班·扫马^[96]、伊本·白图泰^[97]、巴斯喀尔^[98]、马黎诺里^[99]等，以及《元史》《新元史》中提及的数十次使臣往来^[100]，并留下了陆路通行路线的记载。上述出土元代瓷器的诸多地点均分布在行者们的东西路线之上，如阿勒颇^[101]、萨马拉^[102]、大不里士^[103]、列伊^[104]、尼沙布尔^[105]、马什哈德^[106]等。这些地点无不位于西亚陆路交通要道，为区域往来之要冲。如果将视野继续向东拓展，

则会发现出土元代瓷器的遗址亦随着延伸^[107]，直至元朝境内。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弗拉西卜^[108]、撒马尔干内城^[109]、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库尼亚—乌尔根奇城址^[110]、哈萨克斯坦的萨莱楚克城址^[111]、中国新疆伊犁州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112]、吐鲁番高昌古城^[113]、昌吉州吉木萨尔北庭古城^[114]、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达勒特古城^[115]、蒙古的哈拉和林^[116]、内蒙古黑水城^[117]、元上都^[118]、甘肃武威市、天水临洮县、清水县、甘谷县、秦州区、武山县、麦积区等^[119]，以及元大都^[120]。

上述西亚遗址均距离印度洋较远，但皆为当时的重镇，东西贯通构成了一条陆路交通带，并一直向东连接到元朝境内，这是陆路运输路线的显现。据文献所载，当时穿行陆路的人群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其中贡赐和贸易是常有之事，如1298年合赞遣使臣入朝贡珍珠、宝石、猎豹，且以金钱十万市中国货^[121]，甚至不乏借进贡之名行贸易之实者^[122]。贸易之内容，极有可能包含瓷器在内。另，延佑二年（1315年）宣政院上奏：“诸出使西番者，自京兆、临洮府附带碧甸子、铜器、碗碟、鞋履装驼铺以营市利，如此冗滥，合令京兆、临洮府、泥河所设脱脱禾孙提调检查，果有商贩之物，来使科罪，其货没入官。”^[123]按照文献述及器物的一般规律，玉（碧甸子）、铜（铜器）之后，多记漆、瓷。而瓷器作为当时贸易的热门物品，故推测此处之“碗碟”极有可能为瓷碗、瓷碟。宣政院严令禁止“出使西番者”私自贸易，恰说明此事之前已经蔚然成风。“装驼”说明是行陆路。又，据行旅笔记可知，当时陆路往来人员构成多样，有使者、传教士、商人等。而前文所列，在远印度洋区域，高档元青花、龙泉青瓷与质量较之略逊的瓷器协同出现，正是史料所反映的陆路中官商并行的具体体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陆上路线中，在元大都、元上都、甘肃、黑水城、哈拉和林等元朝范围内的遗址中，出土瓷器面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124]。而随着路线向西推移，在高昌古城、阿力麻里等察合台汗国控制范围内，出土瓷器即呈现出品类渐趋集中的态势^[125]，及至金帐汗国域内的萨莱楚克城址、库尼亚—乌尔根奇城址等城址，以及撒马尔罕，即颇为清晰地表现为以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釉瓷、卵白釉瓷、青花瓷^[126]为主的组合。这种瓷器的组合形态继续向西延续，直至本文所考察的诸内陆遗址。这无疑是当时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形成这种选择背后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社会上下（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审美好尚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陆路运输较之海路运载量小、难度更大，运输颇为不易，越远端的市场往往会选择品质越高的产品，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当时的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显然质量要优于福建、广东窑场的产品，所以在商品的选择上会更倾向于浙江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这类个体质量较高、价值较高的产品，它们经由运河和近海航行的船舶，走水路汇聚于元大都^[127]，然后再被西运。

(三) 海、陆接驳

行文及此,不免衍生出一个问题,即:在运输瓷器的过程中,海路、陆路是两条独立的路线,还是彼此之间有交叉的部分?

在前文所列出土元代瓷器的西亚港口遗址中,若干与内陆遗址相通。以霍尔木兹港口遗址为例,该地乃霍尔木兹新城^[128],伊本·白图泰记道,“霍尔木兹是一沿海城市,对面海里是新霍尔木兹,两者相距为三法尔萨赫。不久,我们到达新霍尔木兹,这是一个岛屿,城名哲牢。是一座美丽城市,有热闹的市场,是印度信德的船只停泊口,从此将印度货物运往两伊拉克、波斯和霍腊散(按:呼罗珊)”^[129]。由张萍、程军等学者对当时丝绸之路交通线的研究成果^[130]可知,该地连接着若干内陆遗址。再结合考古资料,同一类别的瓷器可将两个地域进行关联。阿勒颇可经由哈马抵达霍尔木兹,阿勒颇所见的折沿花口菊瓣纹龙泉青瓷盘见于霍尔木兹,阿勒颇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在霍尔木兹亦有所见;马什哈德以及阿富汗诸地也有通路往来霍尔木兹,马什哈德、阿富汗巴格兰出土的元青花在霍尔木兹同样出现;瑙鲁赞、基尔、加斯里·阿布·纳斯尔、菲鲁兹阿巴德均属法尔斯地区,而设拉子与霍尔木兹之间的交通线是法尔斯与波斯湾沿岸地区的重要通道,以上地区出土的元代龙泉青瓷、青花瓷器见于霍尔木兹。亚丁港口也是如此,《伊本·白图泰游记》记其为“也门地区在大海沿岸的港口,……是印度人的停泊地,巨型船只多来此地,印度商人寄居此地,埃及商人亦复如此”^[131]。此地亦可与内陆遗址建立联系,考德安赛拉、阿哈比尔为自亚丁港口至内陆萨那沿线要道,考德安赛拉、阿哈比尔所出元青花同样见于亚丁。如果再将观察的视角进一步细化则会发现,不仅是同一品类的瓷器,就连同一种瓷器也会在不同的港口、内陆遗址出现,如外口沿带弦纹间隔短线纹的龙泉青瓷碗,分别见于伊朗的西拉夫港、阿联酋的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以及伊朗的锡尔詹城;同样绘画的青花折枝花卉纹样则分别出现于阿联酋的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与伊朗的瑙鲁赞和基尔地区。虽然无法排除这两类瓷器作为大宗货物于多地皆有发现的可能性,但其貌似巧合地分别同时出现于港口遗址和内陆遗址,很难不让我们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对两类地域之间的连接关系产生联想。由此推知,元代瓷器极可能可通过亚丁、波斯南部以霍尔木兹为代表的诸港输送至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的内陆。

此外,文献所见如伊本·白图泰贯穿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布哈拉、撒马尔罕、阿富汗巴尔赫、赫拉特、贾姆、图斯、尼沙布尔、巴米扬、喀布尔、加兹尼、印度旁遮普、德里、道拉塔巴德至孟买以北海岸的行迹^[132],正是西亚、中亚与南亚之间陆行,然后接驳印度南海岸港口路线的体现。而考古资料中在印度的东南、西南海岸、马杜赖、德里^[133],阿富汗的巴格兰、喀布尔,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弗拉西卜城址、撒马尔干内城、舍马哈—卡拉城址等地遗址中出土的元代瓷

器,是上述文献所描绘的海路接驳路线的具体反映。如果将伊本·白图泰的行迹路线具体到本文的讨论,伊朗尼沙布尔、阿富汗巴格兰、喀布尔的部分瓷器,有可能来自于印度半岛港口,如奎隆等地的转运。

由此,前文已观察到,西亚近印度洋地区和远印度洋地区之间出土元代瓷器主要面貌是一致的,为浙江龙泉青瓷与景德镇瓷器的组合,而当时海路与陆路的接驳与贯通形成的瓷器在港口与内陆之间流动的态势,或为个中原因之一。

(四) 直接贸易与接力贸易

在元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与西亚之间的海路与陆路均已贯通。两地之间存在着瓷器的直接贸易是显而易见的,西亚或者元朝的使者、商人们通过海路或者陆路,亦或海、陆接驳的方式往来穿梭,实现了瓷器空间转换。

而检视考古资料发现,各遗址出土瓷器数量不等,其中若干遗址瓷器分布密集,比如伊朗的米纳布、霍尔木兹岛等,这是否意味着,较之其他地点,这些城市有可能在当时充当着瓷器区域贸易的中心点?亦或是说,除了直接贸易,是否还存在着接力贸易的情况?由文献记载可知,米纳布和霍尔木兹岛是当时的商品集散地。米纳布为霍尔木兹旧城^[134],马可·波罗于1272与1293年曾两度至此,记曰:“海边有一城,名曰忽鲁模思。城有港,商人以海舶运载香料、宝石、皮毛、丝绸、金锦与大象牙暨其他货物数种,自印度来此,售于他商,转贩世界各地。”^[135]霍尔木兹岛“有热闹的市场,是印度信德的船只停泊口,从此将印度货物运往两伊拉克、波斯和霍腊散”。《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霍尔木兹)大而优美,市港繁荣,犹如印度信德,人们把印度陶瓷从那里运往伊拉克、法尔斯和呼罗珊(笔者按:此处之印度瓷器,多指从印度而来的中国瓷器)。”^[136]前文已述,两地出土了大量的元代瓷器,文献和考古资料两相参照可知,元朝瓷器抵此后以其为中心向周边扩散进行接力贸易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陆路城市也可以成为瓷器的接力贸易中枢。比如伊拉克的瓦西特,该地曾为阿拔斯王朝首都,此处曾出土有若干元代瓷器,包括底心钻孔、其上贴菊花纹的元代龙泉窑青瓷大碗,《穆希特辞典》第九卷曾记载,“隋尼娅是伊拉克瓦西特下方的一个集镇,也以隋尼娅哈瓦尼特^[137](中国店铺)而闻名”^[138],编者提到,“隋尼娅哈瓦尼特”可能是销售中国瓷器的店铺,而瓦西特、巴格达与巴士拉皆有通路相连,所以该处可能亦为接力贸易的一环。而在元朝与西亚的海、陆通道中,繁荣的节点城市颇多,可以想见,该种贸易模式可能是习见当时的现象,参与接力贸易的远不止上述3处地点。

四 结论

梳理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成果可知,在西亚出土(水)了大量的元朝瓷器。近印度洋区域的港口、沉船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以浙江龙泉青瓷、江

西窑场产品居多,福建、广东窑场产品也占有一定比例,北方窑场的磁州窑风格产品目前仅见于伊朗基什。远印度洋区域的内陆遗址多为当时重镇,东西贯通构成了一条陆路交通带,并一直连接到元朝境内,出土元朝瓷器多可见龙泉青瓷、青白瓷、卵白釉瓷和青花瓷的组合。

运输路径方面,有海路、陆路及海陆接驳三种方式。关于海路,当时行海路者公私皆有,所以西亚港口遗址中所见精品瓷器与普通瓷器混杂。从中国到西亚的沉船、港口遗址中,出土瓷器保持着龙泉青瓷、景德镇瓷器以及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这样的固定组合,这表明当时海运瓷器的选择主要倾向于南方地区距离出海港口较近的窑场,其背后的主要考量还是降低成本。关于陆路,在远印度洋区域,高档元青花、龙泉青瓷与质量较之略逊的瓷器协同出现,正是史料所反映的陆路中官、商并行的具体体现。较之于元朝疆域以内及其周边区域所见瓷器组合的多样性,西亚内陆遗址所呈现的龙泉青瓷、青白瓷、卵白釉瓷和青花瓷的组合,可能是当时在利润驱动下市场选择的结果。关于海陆接驳,彼时瓷器海运至伊朗的霍尔木兹、也门的亚丁,甚至中南半岛的奎隆等港口后,可转陆运至伊朗、阿富汗、沙特、伊拉克等地的内陆地区,西亚近印度洋地区和远印度洋地区之间出土元代瓷器主体面貌相近,甚至同一种瓷器出现于前后两类遗址之中,当时海路与陆路的接驳与贯通形成的瓷器在港口与内陆之间的流动态势,或为个中原因之一。

贸易方式方面,有直接贸易和接力贸易两种形式,就后者而言,在元朝与西亚两个端点之间,瓷器贸易出现了围绕着伊朗的米纳布、霍尔木兹岛及伊拉克的瓦西特等区域节点城市展开的接力贸易,而装载着为数颇多元青花及龙泉青瓷的红海沉船,其始发港与目的地为何处,是否从事的是直接贸易还是接力式区间贸易,值得进一步辨析。

注释:

- [1] 考古资料具有较为明确的地理坐标和时代标识,有利于从时空的角度对中国瓷器于元代不同阶段向西亚不同区域的流布进行讨论,故而本文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所见瓷器为研究基础。除考古资料以外,在西亚的元代瓷器还见于公私收藏等传世资料,比如著名的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品,虽然以上未被列入正文之中,但不可否认,均对于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特此志之。
- [2] 该地靠近霍尔木兹岛及波斯湾入海口。a. Peter Morgan, "New Thoughts on Old Hormuz: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Hormuz Region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ran*, vol. 29, 1991, pp. 67-83; 元代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b. 故宫博物院考古所、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年第5期。

- [3] 该地位于波斯湾入海口。1330年前后,忽鲁谟斯王国将政权中心迁至该地,因此其又被称为“新忽鲁谟斯王国”。元代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2]b。

- [4] 该地于13世纪至14世纪初是波斯湾的主要贸易点,约于1323-1324年被霍尔木兹国征服,后趋衰落。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a. 同 [2]b, b. [日] 森达也《伊朗波斯湾北岸几个海

- 港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 [5] 该地在唐代时为中国与波斯贸易的重要港口，因此所见陶瓷以唐宋时期为主，但也发现了元代瓷片，相关情况参见 a. 同 [2]b; b.[韩]申浚《浅谈西亚与南亚地区发现的元明龙泉窑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6期；c. 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9-243页；d.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īrāf: First Interim Report," in *Ira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6, 1968; e.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īrāf: Second Interim Report," in *Ira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7, 1969; f. Tampoe M,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Ceramics from Siraf from the 8th to 15th Centuries A.D.*,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ted Kingdom), 1989.
- [6] 此处曾是萨珊王朝时期的重要港口，连接着美索不达米亚、东非和印度西海岸。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a. 同 [2]b; b. Babak Rahimi, "Subaltern Modernities: The Case of the Arab Iranian Community of Bushehr," in Saïd Amir Arjomand ed., *Social Theory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Global A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pp. 389-414.
- [7] 该海港在西拉夫与霍尔木兹等贸易城市和巴士拉之间担任中继港的作用。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a. 同 [4]b; b.[日]四日市康博《从波斯湾、印度洋西域的海上贸易看中国的外销瓷器》，沈琼华主编《2012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及文化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52页。
- [8] 该港口与霍尔木兹港口贸易往来密切，兴起于14世纪后半叶，衰落于15世纪末。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赵冰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国佐尔法·努杜德港口遗址出土中国瓷片》，《文物》2014年第11期。
- [9] 该地是拉斯海马最重要的遗址之一，该地由14世纪的一个渔村发展而来，于15世纪开始城市化并日益强大，随后在16世纪逐渐被遗弃。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a. De Cardi Beatrice and Doe D. Bri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he Northern Trucial States," in *East and West*, vol. 21, 1971; b. Hansman, J., *Julfar, an Arabian Port: Its Settlement and Far Eastern Ceramic Trade from the 14th to the 18th Centurie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c. King, G. R., "Excavations by the British Team at Julfar, Ras-al-Khaimah,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im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89),"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0, 1990; d. King, G. R., "Excavations by the British Team at Julfar, Ras-al-Khaimah,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im Report on the Second Season (1990),"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1, 1991; e. King, G.R., "Excavations by the British Team at Julfar, Ras-al-Khaimah, United Arab Emirates: Interim Report on the third Seas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2, 1992; f. Hardi-Guilbert, Claire, "Julfar, cité populaire du Golfe arabo-persique à la période islamique," in *Archéologie Islamique*, no. 2, 1991, pp.161-203; g. Sasaki Tatusuo & Sasaki Hanae, "Japanese Excavation at Julfar: 1988, 1989, 1990 and 1991 Seas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vol. 22, 1992, pp.105-120; h. Sasaki Tatusuo, "1993 Excavation at Julfar," in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The University of Kanazawa, vol.20, 1993; i. Sasaki Tatusuo, "1993 Excavation at Julfar," in *Bulletin of Archaeology*, vol.21, 1994; j. 故宫博物院、杜伦大学考古系《拉斯海马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线上的地位——对拉斯海马诸考古遗址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0期。
- [10] 该遗址地处阿曼苏丹国的海滨，依凭海路同中国、亚洲东南部、印度、中东和非洲东部均有贸易联系。后因霍尔木兹的逐渐崛起，尤其是基什对海贸的控制，苏哈尔开始衰退，到17世纪时又有所复苏。相关瓷器出水情况参见 a. Wikinson J. C., "Suhar in the Early Islamic Period: the written Evidence,"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77, vol. 2.; b. [法]米歇尔·皮拉左里(毕梅雪)著，程存浩译《阿曼苏丹国苏哈尔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
- [11] 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北扼红海入口，西与非洲之角隔海相望，南临亚丁湾直通印度洋，占据欧亚非三洲之要冲。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53页。
- [12] 该地位于哈德拉毛省穆卡拉城以东120公里

- 的舍尔迈角北端,为兴盛于9-12世纪的港口遗址。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赵冰《中世纪时期贸易中转港——也门舍尔迈遗址出土的中国瓷片》,《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十一辑),中华书局,2006年,第79-116页。
- [13] 该地处于亚丁东北50余公里处,也是著名的港口遗址。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5]c,第229-243页。
- [14] 同[11],第46页。
- [15][55] 该地位于巴林岛的东北端。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赵冰《波斯湾巴林国卡拉特巴林遗址出土的东亚和东南亚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599-614页。
- [16] a. John Carswell, "Yuan Blue and White and Celadon - A Reappraisal," paper for Yuan blue-and-white conference in Shanghai Museum, 2012; b.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转引自上海博物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 [17] 该地为沟通东西向设拉子到巴姆,南北向米纳布到克尔曼城的重要枢纽。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2]b。
- [18]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2]b。
- [19] 该遗址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南麓。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C. K. Wilkinson, "The Excavations at Nishapur," in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Section II*, vol. XXXII, no. 2, 1937.
- [20] 即刺夷城,旧日曾为伊朗北部之都会,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南麓,德黑兰(Teheran)南约18公里。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a. 三上次男《陶磁の道——东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东京:中央公论美術,2000年,第147-153页; b. 小山富士夫《ギメー博物館にある琉璃釉白龙纹梅瓶》,《大和文华》第39集,第28页; c.[日]三杉隆敏著,白英译《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第5期。
- [21]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2]b。
- [22]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11],第104页。
- [23]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11],第104、108页。
- [24]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20]a,第147-153页。
- [25] 考德安赛拉为自亚丁港口至内陆萨那沿线的小村。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5]c。
- [26] 阿哈比尔为亚丁港口至萨那沿线的小村。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5]c。
- [27] 该地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通向地中海的交通枢纽。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a.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p.107-113; b. 同[16]a; c. 同[16]b。
- [28] 该地位于阿西河畔,距海岸线尚有一定距离。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P. J. Riis and Vagn Poulsen, "Les Verreries et Poteries Medievales," *HAMA Fouilles et Recherches 1931-1938*, IV. 2, Copenhagen, 1957.
- [29]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John Carswell, "Imported Eastern Wares," Donald S. Whitcomb, Janet H. Johnson ed., *Quseir al-Qadim 1978: Preliminary Report*, Gairo: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1982, pp.107-113.
- [30]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20]a,第166-167、177页。
- [31][33][35]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20]a。
- [32] 瓦西特曾为阿拔斯王朝首都。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11],第80页。
- [34] 相关瓷器出土情况参见王光尧、沈琼华《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7期。
- [36] 相类器可见1982年河北省定兴县河内村张弘范(1238-1280)家族墓M1出土龙泉窑青瓷莲瓣纹碗。参见浙江省博物馆编《青色流年:全国出土浙江纪年瓷图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
- [37] 该类器型与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的PI碗相类,《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将PI碗的年代定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文物出版社,2023年,第558页。
- [38] 贴花装饰是元代龙泉常见纹饰。如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贞二年墓出土一件龙泉窑青瓷刻花云鹤菊瓣口盘,该盘外底圈足刮釉垫烧,内底贴塑菊瓣纹,露胎。参见a. 同[36],第299页。采用相似装饰技法者还见于新安沉船,如其出水的龙泉窑青瓷露胎桃花褐斑盘,内底中心位置贴塑桃花,露胎,参见b. 沈琼华编《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另外,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有内心贴塑梅花的青瓷碗,《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将其定为F型1式,年代为南宋末期

- 至元代早期。参见 c. 同 [37], 第 72 页。
- [39] 相类器见于 1988 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贞二年 (1296 年) 张弘略墓出土龙泉窑青瓷双鱼纹盘; 以及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是际大厦基建工地元至元三年 (1337 年) 刘达墓出土龙泉窑青瓷双鱼纹盘。参见 a. 同 [36], 第 295、324 页。另外, 新安沉船也见有相类器物。参见 b. 同 [38]b, 第 193、196 页。
- [40] 相似器型的蔗段洗见于 1982 年河北省定兴县河内村张弘范家族墓 M1 出土龙泉窑青瓷蔗段洗。区别之处在于米纳布出土者为圈足刮釉垫烧, 而张弘范家族墓出土者为圈足裹釉、外底刮釉垫烧。参见 [36]。
- [41] 类似的出筋罐常见于元代。新安沉船即出水有一件器型相类的罐。参见 [38]b, 第 219、243 页。
- [42] 相类器见于 1998 年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岗头村元贞二年张弘略墓出土龙泉窑青瓷刻花三足炉。参见 [36], 第 301 页。另外, 新安沉船也出水有一件龙泉窑青瓷贴花牡丹纹套式炉, 器型与米纳布遗址出土者相类。参见 [38]b, 第 86 页。
- [43] 相似的花口盘见于新安沉船出水者。参见 [38]b, 第 176 页。
- [44] 该碗的修足方式与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的 AⅢ 碗相类,《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将 AⅢ 碗的年代定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参见 [37], 第 546 页。
- [45] 从该盘体量、器型来看, 其与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生产 BⅡ 式官窑类型盘相似, 参见 [37], 第 484 页。
- [46] 该图左侧弦纹间隔短线纹的装饰为元代常见, 如 1994 年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 M1 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莲花纹碗即为此装饰。参见 [36], 第 290 页。
- [47] 该类碗的满模印的做法与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的 A 型青瓷碗 21ZS 采: 79、A 型青瓷碗 21ZS 采: 438、B 型Ⅱ式青瓷碗 21ZS 采: 97、B 型Ⅱ式青瓷碗 21ZS 采: 231 相似, 年代应为元代中晚期。参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编《大帆远影——漳州圣杯屿沉船调查与保护 (2010-2020)》, 科学出版社, 2023 年, 第 25 页。
- [48] 该类碗的修足方式与漳州圣杯屿沉船出水的 2014FZS 采: 06 相似, 年代应为元代中晚期。参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编《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报告之一——2021 年重点调查》, 文物出版社, 2023 年, 第 89、90、116、120 页。
- [49] 该类口沿刻划弦纹间隔短线纹装饰的碗与米纳布遗址出土的碗器型相类, 也见于 1994 年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 M1 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莲花纹碗。参见 [36], 第 290 页。
- [50] 该类碗同样为口沿刻划弦纹间隔短线纹装饰, 相类器型见于 1994 年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 M1 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莲花纹碗。参见 [36], 第 290 页。
- [51] 该类窄折沿凸唇的器型与与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的 CaⅡ 洗相类,《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将 CaⅡ 洗的年代定为元代中晚期。参见 [37], 第 166 页。
- [52] 该类侈口碗的器型及外腹部的青花纹样、绘画技法与内蒙古济宁路窖藏出土的元代青花杯相类。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济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 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第 74 页。
- [53] 这几片瓷片青花叶蔓、花头的画法与 1970 年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窖藏出土龙纹纹相类。参见北京艺术博物馆等编《元青花》,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第 90 页。
- [54] 该碗青花折枝花卉的画法与江西省景德镇陶瓷馆藏一件卷草纹罐相类。该罐器足边刻有“戊子年□□”字样, 结合该铭文可推测该罐的年代当为 1348 年。参见 [53], 第 61 页。
- [56] 该罐胫部的变体莲瓣纹装饰呈现出元代典型特征, 与 1972 年江西省万年县石镇街元泰定元年 (1324 年) 墓出土青白釉刻划花龙纹狮纽盖瓶胫部装饰相类。参见张柏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江西卷)》, 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92 页。
- [57] 此类多竹节式高足杯的相类器型见于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 B 型高足杯, 如 Ba 型的 96B·F26: 500。《景德镇湖田窑址》将其年代定为元代中晚期。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景德镇湖田窑址》, 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第 321 页。
- [58] 此类饼足碗与景德镇湖田窑出土 F 型碗相类, 如 99H·T10①: 221。《景德镇湖田窑址》将其年代定位元代中晚期。参见 [57], 第 315 页。
- [59] 相类装饰风格的白地黑花带划线的罐子可见于 1969 年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元代窖藏出土的白地黑花凤纹罐, 参见张柏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北京卷)》, 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65 页, 图 112。

- [60] 该类外口沿刻划间隔弦纹的碗见于199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后太保村史氏家族墓M1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莲花纹碗。参见a.同[36],第290页。而该类窄折沿凸唇的盘则与龙泉大窑枫洞岩出土的CaII洗相类,《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将CaII洗的年代定为元代中晚期。参见b.同[37],第166页。
- [61] 该类碗的缠枝折枝花卉画法与前文阿联酋的佐尔法·阿尔努杜德港出土有青花折枝花卉纹碗相类。
- [62] 该碗型式与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的芒口深腹碗的A型VI式碗相类。《景德镇湖田窑址》将该类碗的年代定位元代中晚期。参见[57],第96页。
- [63] 景德镇窑产品中,元代初期以青白瓷居多,元代中晚期,卵白釉及青花瓷逐渐出现,这与景德镇这三类产品彼此消长的产生与发展的窑业态势有关。
- [64] 1283年,蒙古贵族李罗携副手叙利亚人聂思脱里教徒爱薛,奉命出使伊利汗国,时因海都之乱陆路交通断绝,遂取海道。于同年冬启程,次年,在忽鲁谟子登陆,后沿波斯法尔斯北上,于1284年10月到达阿兰朝见伊利汗阿鲁浑汗。沈济时:《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10年,第35-46页。
- [65] 1286年,因海都之乱陆路难以成行,忽必烈改派马可·波罗及其父叔随行使团,海路护送阔阔真远嫁阿鲁浑,于1291年初自泉州出发,18个月后,抵达伊利汗国。
- [66] 1299年,元成宗派遣使者前往伊儿汗国火鲁没思(霍尔木兹)。此事见于泉州出土《大德三年奉使波斯碑》“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赉。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勾当。蒙吟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官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推测其往返皆由海道。
- [67] 1301年,杨枢“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如京师,遂载之以来。那怀等朝贡事毕,请仍以君护送西还”。参见(元)黄潘撰《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68] 1318年,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从威尼斯启程,开始东方之旅,并于1321年在霍尔木兹登船,驶往印度、东南亚各地,最后在广州登陆,于1322年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今北京)。参见[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
- [69] 1330年,汪大渊由泉州第一次浮海,1334年夏秋间返国,历时四年。所行区域以印度洋为主,至西亚诸地,如有麻呵斯离(位于今伊拉克西北部,“甘露……仍以瓷器贮之”)、甘埋里(位于今忽鲁谟斯,“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磁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马鲁洞(位于今伊朗西北部)、天堂(位于今沙特之麦加,“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哩伽塔(位于今之亚丁)、撻吉那(位于今波斯法尔斯沿海)、波斯离(位于今巴士拉)、加里那(位于今伊朗之法尔斯海岸,“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碗、细绢、铁条、苏木、水银之属”)。参见(元)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284页。
- [70] 13世纪50年代,伊本·白图泰乘船由印度抵达中国,其后又由中国海路回航至忽鲁谟斯。
- [71] 《元史》卷九四《志第四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1374页。
- [72] 转引自邱軼皓《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80页。
- [73] 康蕊君:《西亚与南亚发现的元青花瓷器:以红海沉船为中心》,《幽蓝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5页。
- [74] 在船舱和地层中发现了晋江磁灶窑、同安汀溪窑、安溪桂瑶窑、德化窑等青瓷,以及江西景德镇窑青白瓷。吴春明对不同时代环中国海所发现的沉船进行了系统梳理,参见吴春明《从沉船考古看海洋全球化在环中国海的兴起》,《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
- [75] 出水了大量元代龙泉青瓷,包括碗、盘、碟、盏、洗、钵、香炉和高足杯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漳州圣杯屿沉船2021年调查收获与初步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 [76] 白礁一号沉船、文甲大屿沉船、北土龟礁二号沉船出水有元代早期福建窑场青灰釉瓷、黑釉瓷等。参见栗建安《闽海钩沉——福建水下考古发现与研究二十年》,《水下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3-64页。
- [77] 出水有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福建窑场青灰釉瓷和酱釉陶、浙江龙泉窑青瓷等。参见[76]。

- [78] 出水有龙泉窑青瓷及福建窑场青灰釉瓷。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编著《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科学出版社，2014年。
- [79] 出水有龙泉窑青瓷、福建窑场酱釉陶器等。参见福建博物院、漳浦县博物馆《漳浦县菜屿列岛沉船遗址出水文物整理简报》，《福建文博》2013年第3期。
- [80] 这几处地点出水了大量元代瓷器。
- [81] 出水了约2000件陶瓷器，几乎全为龙泉青瓷，包括莲瓣纹碗、双鱼洗、大盘和小口罐等，另外还有少量来自广东、福建地区的酱釉罐等。Flecker M., "Rake and Pillage: The Fate of Shipwrecks in Southeast Asia," in Heidi Tan, ed., *Marine Archaeolog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2012, pp.70-85.
- [82] 出水有龙泉窑青瓷。参见林亦秋《寻找龙亚门：印尼宋元明龙泉青瓷的行踪》，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龙泉窑研究》，故宫出版社，2011年，第459-471页。
- [83] 出水有景德镇卵白釉瓷。参见 Roberto Gardellin, "Shipwrecks around Indonesia,"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Newsletter*, 2013, pp.15-19.
- [84] 出水了大量14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包括青花瓷、枢府瓷、青白瓷，另外还有龙泉青瓷、德化白瓷、福建青瓷及褐釉陶罐、小口瓶。
- [85] 出水有龙泉窑青釉瓷、福建窑场青灰釉瓷和酱釉陶等。参见 Alexandra Avieropoulou Choo, *Archaeology: 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s National Museum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Museum, 1987, pp.85-88.
- [86] 出水了若干元代龙泉青瓷，器形有碗、盘等。参见[27]a，第109-110、174页。
- [87] a. 项坤鹏：《浅析东南亚地区出土（水）的龙泉青瓷——遗址概况、分期及相关问题分析》，《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b.[日]青柳洋子《东南亚发掘的中国外销瓷器》，《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 [88] 出土了元代龙泉青瓷，福建磁灶窑褐釉瓷、漳州窑青灰釉瓷，景德镇窑枢府瓷等。参见故宫博物院等《印度奎隆港口遗址2014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22年第8期。
- [89] 在巴拉特伊尼·科拉买、科特卡努努两地出土了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瓷器。参见在别利亚巴台那买村出土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瓷器。参见[日]辛岛升著，程晓中译《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土的中国陶瓷片》，《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 [90] 在斯里兰卡的波隆纳鲁瓦、雅巴哈瓦、达地加马、攀多尼瓦出土有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参见[日]三上次男《斯里兰卡发现中国瓷器和伊斯兰国家陶瓷——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瓷器调查纪实》，《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 [91] 出土青花瓷和龙泉青瓷等，参见[27]a，第112页。
- [92] 该地也出土青花瓷和龙泉青瓷等，参见[20]c。
- [93] 1254至1255年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行，前往哈刺和林觐见了蒙哥汗（元宪宗）后返回，返程历时8个月。参见[亚美尼亚]乞刺可斯·刚扎克赛著，何高济译《海屯行纪》，中华书局，1981年。
- [94] 1259年，常德奉蒙哥之命出使旭烈兀，往返共14个月。参见（元）刘郁《西使记》，杨建新等编注《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 [95] 1260年，马可·波罗之父叔波罗兄弟随旭烈兀汗派去觐见忽必烈汗的使臣，前往京都，历时一年。于1269年作为大汗派往罗马教皇的使节，从陆路返回欧洲。1271年，波罗兄弟及马可·波罗受教皇委托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本拟由“忽里模子”（Hormuz）乘船来中国，又“唯船舶不堪航海之用”，所以改行陆路。历时三年半，抵达开平府（元上都）。参见a.[意]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悌谦笔录，余前帆译注《马可波罗行记》，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b.[意]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悌谦笔录，冯承钧译注《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 [96] 1275年，景教徒列班·扫马和马忽思师徒二人自北京出发，随商队西行，赴耶路撒冷朝圣，觐见海都（窝阔台系宗王），后抵呼罗珊地区。参见佚名著，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1280年后准备回国，因海都之乱而作罢。海都之乱自至元五年（1268年）始，大德十年（1306年）止。战乱波及阿力麻里、锡尔河、呼罗珊、也里（今阿富汗之赫拉特）等中亚、西亚地区。
- [97][132]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对东西交通的海路与陆路进行了多次尝试，其中的陆路环节贯通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德里苏丹国。参见[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华文出版社，2015年。
- [98] 1338年，教士巴斯喀尔（Pascal of Vittoria）的

信札称其此前从阿维尼翁出发,经威尼斯、君士坦丁堡、萨利亚、塔那、萨莱、萨莱楚克、玉龙杰赤到达阿力麻里。参见 a. Henry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31-237; b. 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83-290页。

[99] 1339-1342年,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奉教皇之命回访元朝,从阿维尼翁出发,经那波利、君士坦丁堡、喀法、萨莱、阿力麻里抵大都。参见 a. 同[98]a, 第2卷,第336-339页; b. 同[98]b, 第248-251页。

[100] 限于篇幅,兹不列举展开。以上史籍虽未确载是陆路亦或是海路,但依据其贡献之物(如“马”“虎”“驼”等)及其他细节,大致可推断多应是循由陆路。

[101] 该地为区域重镇,13世纪蒙古人曾多次侵袭该城,14世纪伊本·白图泰曾前往该地,记其商业发达,街市宽广,《史集》曾记载叙利亚人从伊尔汗国境内掳掠人口到该城出卖。

[102] 即萨马腊,该城位于巴格达与大不里士往来途中。

[103] 大不里士,即帖必力思、讨来思、桃里寺等,该城为伊尔汗国首府,为区域中心,辐射四方,海屯、常德、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皆行经于此。马可·波罗记,“此城位置适宜,印度、报达、毛夕里、格儿墨昔儿及其他不少地方之商货,皆辐辏于此。拉丁商人人数,尤其是热那亚商人,亦至其城购货,并经营他种商业”。参见 a. 同[95]a, 第31页。鄂多立克记,“这是一个比现今世上任何其他城市更著名的城市,更宜于贸易的地方。因为地面上要没有何种粮食,或何种货物,你在讨来思却找得到它的大量贮存”。参见 b. 同[68], 第34页。

[104] 即刺夷、列夷等,该城为波斯北部的商业、交通中心,1255年海屯西返时记其为“刺夷大城”,1270年阿八哈汗曾在该地接见宗王。参见[波斯]拉施特编,余大钧译《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3页。

[105] 即你沙不儿等,伊本·白图泰记,该城“生产水果,花园流水遍布,而且房舍美观,贯穿全城的河流有四条,市场美丽宽敞”。参见[97], 第233页。

[106] 即奴罕,该地位于徒思城之侧,伊本·白图泰记,后者曾是“呼罗珊最大的城市之一”。

参见[97], 第232页。

[107] 刘未对中亚及东欧若干遗址中所出土的宋元瓷器资料进行了收集。参见刘未《中亚及东欧地区出土宋元陶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6期。

[108] 该地位于撒马尔罕城北郊,出土两件龙泉青瓷,一为花口折沿菊瓣盘,一为敛口划花高足碗,年代均为14世纪早中期。L. Sokolovskaya and A. Rougeulle, “Stratified Finds of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Pre-Mongol Samarkand (Afrasiab),”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6, 1992.

[109] 撒马尔干,又记作撒麻耳干、寻思干、邪米思干等,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该城,其地商业繁荣,是河中地区的交通和商贸中心。海屯、常德途径此地,后者记其“城大而民繁”,1344年伊本·白图泰由此过忒耳迷后进入呼罗珊。1972年,于撒马尔罕内城出土有元景德镇青花瓷八棱瓶一件。参见弓场纪知《サマルカンドの花嫁—ウズベキスタンに中国の染付をもとめて—》,《陶説》第717号,2012年,第56页。

[110] 该地为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又记作兀笼格赤等。巴斯喀尔、尼古拉·波罗等曾途径此地。1344年伊本·白图泰在该城停留,言其是“突厥人最宽阔、最宏伟、最美丽、最庞大的城市。市场建筑雅致,街道宽敞,房舍鳞次,真是美不胜收。该城人口之多宛如潮涌”。参见 a. 同[97], 第211页。裴哥罗梯(Frands Balducci Pegolotti)记曰,“玉龙杰赤商务繁盛,货到即可消(销)出”; b. 同[98]a, 第287-290页; c. 同[98]b, 第312-313页。该地出土有龙泉青瓷。参见 d. 同[107], 第36页注释3。

[111] 该城又记作萨莱契克、塞尔诸克、撒拉康科等,位于乌拉尔河右岸,是欧洲进入亚洲的必经之地。1332年伊本·白图泰曾途径此地。该地出土有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卵白瓷。参见[107], 第36页注释4。

[112] 该地又记作阿里马,常德、巴斯喀尔、马黎诺里等曾经过此地,14世纪后该地长期为察合台汗国控制并作为汗王驻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元朝瓷器,包括:龙泉窑碗、盘、高足碗,景德镇青花高足碗、青白釉杯、碗、卵白釉碗、盘,钧釉壶,磁州窑瓷片等。参见 a. 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青花等文物》,第26-31页; b. 张柏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新疆卷)》,科学出版社,2008

- 年,第173-184页;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358-359页。
- [113] 该地又记作哈拉火州、火州、高昌,13世纪畏兀儿亦都护驻地,14世纪初及以后为察合台汗国统治,在该地发现龙泉青瓷盘。参见a.谭旗光《吐鲁番和奇台出土的元龙泉和钧瓷》,《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b.同[112]b,第183页。
- [114] 该地又记作别失八里、北庭、鳖思马,是多条交通线汇聚的中心。13世纪畏兀儿亦都护驻扎此地,亦都护迁火州后,该地为元廷直接控制,14世纪初并入察合台汗国,直到元末。该地出土有钧窑瓷盘残片和青白瓷盖残片。参见a.孙秉根等《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b.王炳华《“丝路”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 [115] 该地又记作普刺、不刺、孛罗等,1259年常德西行途径时记其“城居肆圉错,土屋牖户皆琉璃”,较为繁荣。13世纪末为察合台、窝阔台汗国控制,最终并入察合台汗国。参见a.同[94],第238页。该地出土元代瓷器包括钧窑、青白瓷、褐釉瓷、蓝釉瓷、淡绿釉瓷、天蓝釉瓷、黑褐釉瓷等。参见b.李有松《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发现察合台汗国铜币》,《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c.韩雪昆《察合台汗国铜币的发现及初步研究》,《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
- [116] 该地一度显赫,蒙古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皆坐镇于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后,于至元九年(1272年)迁都大都,哈拉和林方失去都城地位。该地出土元代瓷器包括白地黑花瓷、白釉剔花瓷、黑釉划花瓷、青釉瓷、黑釉瓷、褐釉瓷、红绿彩瓷、钧釉瓷、青花瓷、青白釉瓷等。参见[107],第51页注释3。
- [117]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在该地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元代后期因黑水改道,绿洲为沙漠所侵蚀,居民别迁,城郭废弃。马可·波罗提及,“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离此亦集乃城后,北行即入沙漠。……行此四十日沙漠毕,抵一北方之州……哈刺和林城延袤三里,是为昔日鞑靼人离其本地以后所据之第一城。”参见a.同[95]a,第123页。该地出土元代瓷器包括龙泉窑系青瓷、耀州窑系青瓷、钧窑瓷器、景德镇窑瓷器、磁州窑系黑釉、酱褐釉、白地黑花、纹胎、红绿彩瓷等。参见b.李仲谋《谈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
- [118] 自忽必烈时,该地作为元朝国都,直至元灭。出土元代瓷器包括青釉瓷、白地黑花瓷、剔花瓷、钧釉瓷、黑釉瓷、白釉瓷、茶叶末釉瓷、红绿彩瓷、青花瓷等。参见魏坚《元上都》(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193-327页。
- [119] 元朝分别在上述地区设立驿站,如永昌府站、辛记站、临洮站、故关站、秦亭站、伏羌站、秦州站、文盈站、社树坪站等。上述这些地区出土有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瓷器、白釉瓷器、卵白釉瓷器,钧窑瓷器、磁州窑类型瓷器等。参见许星星《甘肃天水地区出土元代文物整理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120] 该地出土有青釉瓷、白地黑花瓷、黑釉瓷、酱釉瓷、钧釉瓷、青白釉瓷、卵白釉瓷、青花瓷、蓝釉瓷、黄釉瓷、哥釉瓷等。参见a.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第6期;b.赵光林《介绍几件元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年第8期;c.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d.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缘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e.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玉河:2007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36页。
- [121] “1298年(笔者注:大德二年),合赞曾遣木阿匝木法合鲁丁阿合马(moa'zzam fak-hr-ud-din ahmed)不花伊勒赤(bocai iltchi)往朝中国皇帝铁木耳(temor)可汗,献大珠宝石奇珍异物,内有文豹。法合鲁丁并自齐珍宝往献。合赞以金十万付使臣,命购中国土产。使臣自杭海山(cangcai)至可汗廷,凡物皆由驿站供应。使臣至大都,献贡物,可汗赐以上尊。命于使臣居留之时,供应其衣粮仆役及马四十五匹。使臣留可汗廷者四年,及其还也,可汗厚赐之。并以答书及蒙哥汗时代(1251-1259)以来旭烈兀应得之岁赐付使者,遣官一人送使者还国。后法合鲁丁死于道。”参见a.[伊尔汗国]舍刺甫丁·奥都刺《瓦撒夫书》第4册,转自[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19页。又,《新元史》也有记载,如“大德二年(1298年),遣使臣

曰漠阿臧、法克哀丁、阿喝美特，曰布喀伊耳赤，入朝贡珍珠、宝石、猎豹，且以金钱十万市中国货。使臣至，成宗优礼之，赐酒慰劳，留四年始辞归。温诏报合赞，赐赍甚厚。旭烈兀位下岁赐及五户丝久贮府库，至是遣使颁与之”。参见b.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九《列传第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5页。

[122] “泰定三年十一月，同一个月中不赛因遣两批使者来献虎和马，这大概是从伊朗来的回回人假借使者之名与元朝宫廷进行贸易。其中有一名典型的代表名‘怯列木丁’，至顺二年八月被揭发出来‘矫王命来朝’”。参见陈春晓《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55页。

[123]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19421，中华书局，1986年，第7233页上。

[124] 见有青釉、白釉、青白釉、黄釉、黑釉、酱釉、蓝釉、钧釉、青花、白地黑花、白釉剔花、黑地划花瓷器等。

[125] 除了达勒特古城出土有钧窑、青白釉、褐釉、蓝釉、绿釉、黑褐釉瓷器外，其余地点主要为龙泉青瓷器、景德镇青白瓷器、卵白釉瓷器、青花瓷器、钧窑瓷器及磁州窑风格瓷器。

[126] 虽然萨莱楚克城址、库尼亚—乌尔根奇城址两处遗址未见青花瓷器，但在与之相邻的诸遗址中，如察列夫斯科耶城址（金帐汗国续建都城别儿歌萨莱）、博尔加尔城址（即不里阿耳）等，皆有青花瓷器出土。

[127] 刘未亦曾行文提及，当时元朝境内最为合适的交通节点城市是“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的元大都。参见[107]。

[128] 据《瓦撒夫史》记载，旧城毁于1301年，因此新城建立当晚于此。该城落成后，商业更为繁盛，使者商旅往来于此，不绝于书，诸如鄂多立克、杨枢、伊本·白图泰、汪大渊等皆曾落脚于此。

[129] 同[97]，第218页。

[130] 程军：《13—14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线复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131] 同[97]，第199页。

[133] 在德里的多格努克王朝遗址废墟上发现了70余件元青花大盘、大钵和龙泉青瓷大盘。参见[89]。

[134] 《拂林忠献王神道碑》记，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丞相孛罗奉使波斯伊儿汗国，从海路抵忽鲁谟子，此时应为霍尔木兹旧港。参见林梅村《波斯湾古港的变迁——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一》，《紫禁城》2012年第4期。

[135] 同[95]a，第58页。

[136] 同[97]，第129页。

[137] 葛铁鹰指出，“隋尼娅”意为“中国的（阴性），中国人（女），瓷器，盘子”。又在释读“隋尼娅哈瓦尼特”中提到，“之所以将这个词组意为‘中国店铺’，一是要忠于原文，而是因为不知道这个位于瓦西特附近的‘中国商品一条街’，与希提和纳忠先生在各自的《阿拉伯通史》中提到的、位于巴格达的‘中国市场’，是否为同一个地方。应该说古代阿拉伯地区专营中国商货的市场，并非罕见。……其实，亚丁、希拉、俄波拉和巴士拉等常年有中国商船停泊之地，都有可能形成此类市场，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懂阿语的人可以看出，这个词组直译出来应为‘店铺中国’……另外隋尼娅有瓷器的意思，所以最初的几家店铺（阿文用的是复数）是专卖中国瓷器的，也未可知。”参见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一），《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3期。

[138] 该书的编纂者菲鲁扎巴迪（1329—1414），为波斯著名语言学家、辞典编纂家。曾游历西亚和埃及。参见[137]。从该书作者的生卒年可知，其游历的时间大约与元朝所对应的的时间相重合，所以其记载的当为彼时发生的事情。

（责任编辑 高 翠）